

“大华语”视角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策略思考^{*}

姚 敏

(北京华文学院 北京 102206)

[摘要] 随着“大华语”概念的提出和研究的推进,我们发现“大华语”传播是汉语国际传播中的独特领域,其传播对象、历史和动因等都有鲜明的特点。本文在剖析汉语国际传播构成的基础上,分析“大华语”传播在汉语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比较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不同传播圈传播主体的优劣势,指出应当重视“大华语”传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调整当前的汉语国际传播策略的新构想。

[关键词] 大华语; 汉语国际传播; 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397(2019)01-0020-07

DOI:10.16499/j.cnki.1003-5397.2019.01.004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er Chinese

YAO Min

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eater Chinese and the relevant studies,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Greater Chinese, with its distinctive communication object, history and motivation, is more and more recognized as a unique fiel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le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Greater Chinese,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nd gives suggestions for adjustment of the current strateg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收稿日期] 2018-03-14

[作者简介] 姚敏,北京华文学院副教授,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组成员,博士,主要研究华文教育、语言传播、语言政策与规划。

^{*} 本文受到“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经费资助。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麻卓民董事长、澳大利亚新金山中文学校孙浩良校长和澳大利亚中文教师联合会主席李复新博士的大力支持,以及李宇明教授、郭熙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Keywords: the Greater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一 引言

陆俭明(2005)提出“大华语”概念,其初衷是“首先有助于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其次更有助于推进世界范围的汉语教学”。可见,陆先生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大华语”的影响力和层次性: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助力汉语的国际传播。新加坡学者周清海(2016)指出,逐渐融合几乎是“大华语”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李宇明(2016)在《全球华语大词典》的序言中将“大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后又专门发文探讨了“大华语”的概念、特征、发展趋势和研究重点(李宇明,2017)。

笔者认为,“大华语”是在汉语标准语基础上更高层面的共同语概念,强调全球华人之间的交流和认同。其核心要义是强调全球视野和全球意识,这是一种更为包容的语言观念。那么,用这种语言观念来审视当下的汉语国际传播会不会有新的发现呢?汉语国际传播有哪些力量在发挥作用?其中,“大华语”传播的作用如何?汉语国际传播策略是否可以更加完善?本文将对此进行进一步探究。

二 汉语国际传播的构成

Kachru(1985)根据世界上说英语的国家和地区的特征,给出了三个层级的模型,包括内圈、外圈和延伸圈。与此相仿,遍布全球的汉语国际传播,并非杂乱无章。李宇明(2003)、吴英成(2010)、吴应辉(2013)等学者都曾对汉语国际传播做过圈层的划分。

结合上述研究,本文根据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群及其汉语学习的特点,将汉语国际传播划分为三个战略层次,即“大华语”传播圈、汉字文化圈和辐射圈。如图1所示:

处在最内层的“大华语”传播圈,是指以中国为内核的全世界华侨华人对“大华语”的传承与传播。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是受内核影响最大的人群,是“大华语”传播圈的主要组成部分。华语是海内外华人之间天然的情感纽带。几百年来,海外华语的传承生生不息,海外华侨华人对其子孙后代坚持华语教育,一直在为汉语的国际传播和传承做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个传播圈最原始的传播动因是人口的迁徙,移居国外的华侨华人将中华语言和文化一同带到了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汉语国际传播的兴起为他们学习华语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这个圈层可以说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大本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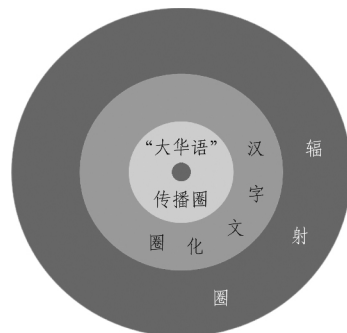


图1 汉语国际传播圈

中间层“汉字文化圈”,是指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汉语学习者对汉语的学习和传播。与“汉语辐射圈”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历史上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曾经或正在使用汉字,对中华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并不陌生。这些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相对比较容易,特别是在汉字书写方面比起纯粹的外国学生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这是历史上汉字文化境外传播的结果,至今已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其传播动因除了经济因素外,文化因素也发挥了相当大

的作用。

最外层是汉语“辐射圈”。在这一层级中,汉语作为一门外语在全球范围内被学习、使用和传播。学习者是那些既无华人血统又无中华文化背景的母语非汉语的外国人。在学习汉语之前,他们对汉语和中华文化是陌生又充满好奇的。最近十几年来,这个传播层面的人数激增,而且呈现出学习者低龄化的倾向。最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由于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商贸交流过程中,学会汉语能创造更多的机会和价值。

这三个不同层面的汉语传播圈在传播对象、传播历史和传播动因上各具特色。它们共同构成了汉语国际传播的大格局,在汉语国际传播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近年来的研究多集中在最外层的“辐射圈”。对于汉字文化圈的研究不够丰富,或许是因为单从人群看这两个圈层有包含关系。而针对“大华语”传播圈的研究,确如吴应辉(2015)指出的那样:“在过去十多年间,对母语为非汉语的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得到了高度重视,但作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母语为华语的海外华人的华文及中华文化教育受到重视的程度远远低于前者。”

三 “大华语”传播圈的作用

除内核外,“大华语”传播圈主要是依靠遍布全球的6000万华侨华人。贾益民(2007)曾指出,在汉语学习者中,华人华侨学生约占总数的70%。海外华侨华人不仅与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更自觉地将华语通过海外华文学校、华文媒体和华人文学带到了世界各地。早在“汉语热”出现之前,华人就一直在默默地为华语的传承和传播做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世界范围看,学习、使用、教授和传播汉语的绝大多数还是华侨华人。对于华裔青少年来说,汉语在某种意义上虽然不是第一语言,却是“母语”,他们拥有着天然的优势,他们更为自觉地推进中外语言与文化交流,是所谓有“意愿”也有“能力”的群体(贾涵,2016)。

从汉语传播方式来看,“大华语”传播圈主要是在华人家庭、华文学校、华人社会内部自发的传承和传播,起初影响的范围也基本上是在所在国的华人社区,后来随着华人和汉语影响力在海外的增加而逐渐扩大到了当地社会。华语传播最主要的方式是代际间纵向传播,最近几年呈现出向不同族裔横向传播的趋势。

海外华文学校是华语传播的主要媒介。海外华文学校历史悠久。华侨最早在海外设立书院,据华侨志总志记载,以1729年^①荷属东印度首都巴达雅所设的“明诚学院”为最早(董鹏程,2010)。如今,海外华校早已遍布全球,这些学校大多由华社或个人开办,其中一部分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老华校,这部分华校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还有一大部分是由新移民创办的各类周末补习学校或社区华文学校,在欧美一些国家又称中文学校。

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国已经形成拥有几十万华文教师、几百万在校生的两万所中文学校,构建起从幼稚园到大学颇具规模的海外华文教育格局。作为海外历史最久、覆盖面最广、根植最深、基础最牢的中华语言文化基础教育,海外华文教育被称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留根工程”,中华文化在世界传扬的“希望工程”,也是华侨华人社会重要的“民生工程”^②。

近年来,海外华文学校越来越受到住在国非华裔的欢迎,生源越来越广泛,非华裔学生越来越多。以华文教育开展得最为成熟的马来西亚为例,越来越多的非华裔家长愿意让孩子到当地华文小学学习,据中新网报道,“非华裔入读华小已形成乡区的一种风潮和趋势”^③。不仅马来西亚,世界各地很多华文学校都呈现出受到住在国非华民众欢迎的趋势。在一些欧洲国家,由于有相对地道的语言环境和师资,华文学校成为外国学生特别是青少年汉语学习者青睐

的学习场所^④。

除华文学校外,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在汉语国际传播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以泰国为例,20世纪中期,泰国政府采取同化政策,要求泰国出生的华人入泰国籍,且必须接受泰文教育。许多华人家长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华文学校读书,泰国华文教育日趋萎缩。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泰两国往来日益频繁,华人首先意识到了华语的重要性。华人群体率先团结在一起,为拯救泰国华文教育奔走、呼喊。华人群体多次召开联席会议或专题座谈会,研讨促进华文教育发展的有关事宜。(姚敏,2017)这些都为泰国的“汉语热”拉开了序幕。一直到现在,海外很多华文学校背后都依靠着当地华社的支持,每年为华文学校募捐也成为不少地区华社的传统。同时,华人社区也是海外华侨华人过好海外华语生活的重要场所和必要保证。

海外华侨华人和海外华人社区是海外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重要推动者。如今,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更成为学习汉语、教授汉语、传播汉语的中流砥柱。不难看出,整个“大华语”传播圈以中国为核心,自觉地传承、传播汉语,是汉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动力源泉,其良性发展会促进另外两个汉语传播圈的健康发展。在汉语国际传播的大军中,海外华文学校像一颗颗种子遍布世界各地,恰好可以有效地弥补现有传播主体的不足和单一性。整个“大华语”传播圈以内核为中心,其他华语社区作为汉语在当地的中转站、接力站和传播源,在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

总之,“大华语”传播圈历史悠久,与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植根当地,传播渠道成熟,是值得重视的汉语国际传播力量。

四 汉语国际传播策略思考

(一) 孔子学院与海外华文学校的比较分析

全球化的时代,世界上的主要强势语言都在争取国际传播,争取语言传播效益的最大化,汉语也在其列。在近十几年的汉语国际传播中,“汉语辐射圈”的范围迅速扩大,使汉语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这其中,孔子学院功不可没。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建立,到2017年12月31日,全球146个国家(地区)建立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⑤。13年间,孔子学院几乎遍布全球各大洲,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学习汉语的重要场所,为加强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合作、推进汉语进入所在国教育体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在孔子学院大力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特别是某些西方国家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对汉语国际传播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正如吴应辉(2013)所指出的“‘汉语国际推广’这一术语曾一度被官方广泛使用。它能充分反映有关机关要把汉语推向世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美好愿望,但会带来‘文化侵略’之嫌的负面效应。”当然,除了术语运用颇具争议外,孔子学院的身份和一些颇具政治色彩的推广活动也遭到了非议(张东辉、和亚林,2016)。孔子学院的形象、定位及其发挥的功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反观海外华文学校,它们植根于当地社会,熟悉所在国的风土人情,依托海外华侨华人,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优秀中华文化。海外华文学校中有的已作为当地民族文化教育的一部分,纳入当地教育体系。有的深入当地社区,成为社区教育的典范。大多数发展成熟的海外华社不仅有海外华文学校,还有丰富的华语传播渠道,诸如华文报纸、华文广播及华文电视频道等华文媒体,这些都是其优势。不过,海外华文学校大多是由海外华侨华人或者华社自筹资金创办

的,学校的招生和教学效果直接关系到海外华文学校的收入和规模。这就使海外华文学校面临一些问题,比如,由于教师工资水平不高,海外华校的师资不稳定,特别是年轻教师,为了维持生活,很多都是在华校做兼职,一旦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就会跳槽离开学校^⑥。在一些孔子学院发展非常快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孔子学院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其对外招收学生很多都是免费的,这对于需要靠学生学费来运营的当地华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有的学校甚至面临生存危机^⑦,这在无形之中造成了汉语国际传播圈之间的内部矛盾。

应当说,两种传播模式在汉语国际传播的当下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这两种模式各有特点,但也有各自的局限性。民间办学虽然有不少困难,但是生命力比较顽强,不会给人大张旗鼓的压迫感。如何扬长避短、避免矛盾,使这两种模式相互借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二)“大华语”传播视角下的汉语国际传播构想

对于汉语的国际传播不仅要在战略上重视,更要在策略上巧妙处理,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汉语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母语者的语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汉语的国际传播显然还没有取得与中国目前的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语言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华语”传播视角审视汉语国际传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结合上文分析,本文提出几点构想:

1. 重视大华语传播圈的独特优势,更大程度发挥其在汉语国际传播中的作用。

海外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加强华文教育对汉语走向世界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上,可能很难再找出像华人这样执著地传承和维护母语教育的族群(郭熙,2015)。提出“大华语”传播圈的概念,有助于增强全球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使华侨华人具备主动传播汉语和中国优秀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汉语国际传播战略中,应该重视“大华语”传播圈这个独特的资源,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利用已经成熟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媒介,引导海外华侨华人将华语传播寓于中外民众日常生活中,用住在国民众更能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的故事,弘扬中华语言文化。如前文所说,海外华文学校大多是自筹资金,在教育市场竞争中生存,了解市场规则。同时,海外华校植根于华人所在国,不仅了解所在国政策,也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了然于心,更有各个华社作为依托,有大量人脉资源、传播媒介可以利用。

此外,其他华人社区也能在汉语国际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华人较为集中的东南亚国家,高层次的华文教育还能为所在国及其语言文化相似的其他国家培养华语师资。”(吴应辉,2015)据了解,马来西亚华人可以到印尼教授汉语,而新加坡则成为大量幼儿汉语教师的培养地^⑧。而在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很多周末制中文学校都实现了主动与主流学校融合,提供教学资源 and 师资的良好范例^⑨。这些都体现了“大华语”传播圈的帮扶和传递作用。

2. 充分认识每一圈层的特点及作用,协调处理好三圈之间的关系。

从人群和学习特点来看,世界范围内汉语国际传播包含三个传播圈(如图1),协调好三个传播圈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好各自的优势,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除“大华语”传播圈外,汉字文化圈的汉语传播应该充分重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一方面加强与这些国家传统汉语研究的共同交流和深度合作,另一方面通过有吸引力的文化产品引起共鸣,吸引年轻人对汉字和汉语的兴趣。

而在汉语辐射圈,要设法巩固现有成果,使学习汉语具备更多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对于青少年学习者,争取汉语进入所在国外语教育体系,承认学分,研发更多外国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电子文化产品。而对于成年汉语学习者,要让他们能保持学习兴趣,学会用包容的视角

看待中外文化的差异。同时,进一步创造汉语的经济价值,创造就业机会。

以汉语国际传播圈来说,以“大华语”传播圈为核心,整合两岸资源,组成语言联盟,制定合理的语言传播规划,进一步扩大到整个“大华语”地区,依靠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社将汉语进一步扩大到所在国,即辐射圈。同时要注意维护好汉字文化圈国家非华人社区^⑩的汉语传播。

这三个圈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汉语国际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如图2所示。

这三个传播圈以内核为中心逐渐向外扩散,内核首先影响“大华语”传播圈,“大华语”传播圈进而影响汉字文化圈和辐射圈。内核要利用和整合不同传播圈的资源,充分挖掘不同传播圈的潜力,汲取不同传播模式的优势,做到传播效益最大化。

3. 以国家战略为政策定位、以实用主义为传播理念、以非政府机构为实际传播主体的传播策略。

首先,制定汉语国际传播战略,需要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汉语国际传播政策应始终定位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有效融入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宏观战略中,促使汉语传播既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的一种有力工具,又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目标。

作为内核,中国要从国家层面通盘考虑汉语传播资源,从政治、经济、文化战略高度整合汇聚国家语言传播的资源。这就需要协调不同政府部门的资源,汲取各自优势,统筹规划。

其次,应该坚持实用主义的传播理念,强调汉语的有用性和工具价值。一种语言要具有实用性,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持久。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语言对经济的影响,不少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关注了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和创造汉语的经济价值。国外很多研究发现,移民的语言能力同其就业状况、经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李宇明,2012)。

华侨华人大多具有双语或多语能力,如果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使华语为他们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无疑会为他们增加更大的动力去使用华语、传播华语。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充分发挥其语言能力的大好良机。当然,在华人不多或是华文教育、华人社会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应该鼓励更多的民间机构、中资企业、中外合作机构积极投身汉语传播事业,努力提高汉语的实用性和经济价值。逐步做到汉语传播主体市场化、当地化和非政府化。

孔子学院应该充分发挥海外汉语传播“黏合剂”的作用,挑选优质的传播主体,保障其师资和经费支持,更多地为汉语的国际传播提供咨询、认证和指导。尽量联合所有海外汉语传播的机构,维护好海外汉语传播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汉语的国际传播,从而巧妙规避可能产生的负面评价。

五 结语

从“大华语”传播的角度审视汉语国际传播,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维度去观察汉语国际传播的现状,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汉语国际传播的构成。在汉语国际传播蓬勃发展的势头之下,我们更需要冷静分析汉语国际传播的构成和各自发挥的作用,整合资源,减少不必要的内部矛盾,调动各方的积极因素,为实现汉语传播的利益最大化做不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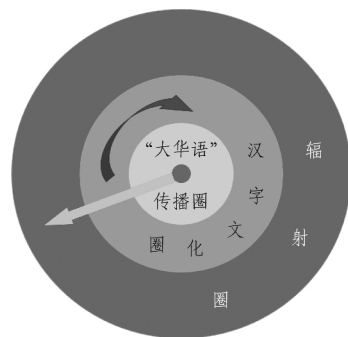


图2 汉语国际传播圈关系图

度的思考。

[附 注]

- ① “明诚学院”成立的时间有两种说法。另一说为 1690 年。
- ② 参见第四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主题报告。
- ③ 参观《非华裔钟情华小成风潮 学生语言障碍日益受关注》, <http://www.chinanews.com/hwjy/news/2010/02-26/2141011.shtml>。
- ④ 笔者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董事长麻卓民所得。
- ⑤ 参见孔子学院年度报告 <http://www.hanban.edu.cn>。
- ⑥ 笔者在走访海外华校时, 师资的不稳定是很多华校都面临的问题。
- ⑦ 美国梁培炽先生在北京华文学院的讲座“美国华文教育”中提及。
- ⑧ 台湾任弘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讲座中提及。
- ⑨ 笔者访问澳大利亚新金山中文学校孙浩良校长所得。
- ⑩ 汉字文化圈的几个国家由于政治、经济以及历史等因素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微妙, 也很复杂。因非本文关注的重点, 暂不做详尽讨论。

[参考文献]

- [1] 董鹏程. 华文教育——华人世界的纽带[J]. 世界华文教育 2010 (3).
- [2] 郭 熙. 关于新形势下华侨母语教育问题的一些思考[J]. 语言文字应用 2015 (2).
- [3] 贾 涵. 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战略问题及策略分析[J]. 中华文化论坛 2016 (7).
- [4] 贾益民. 海外华文教育的若干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 2007 (3).
- [5] 李宇明. 信息时代的中国语言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 2003 (1).
- [6] 李宇明. 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J]. 语言文字应用 2012 (3).
- [7] 李宇明. 全球华语大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8] 李宇明. 大华语: 全球华人的共同语[J]. 语言文字应用 2017 (1).
- [9] 陆俭明. 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A]. 汉语教学学刊(第一辑)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吴英成. 汉语国际传播: 新加坡视角[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1] 吴应辉.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理论与方法[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 [12] 吴应辉. 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新常态特征及发展思考[J]. 语言文字应用 2015 (4).
- [13] 姚 敏. 中国华文教育政策历史研究——语言规划理论透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 [14] 张东辉 和亚林. 孔子学院的国际舆论环境研究——基于西方媒体报道的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 2016 (1).
- [15] 周清海. “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J]. 汉学报 2016 (1).
- [16] Kachru, Braj B.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In R. Quirk & H. G. Widdowson(eds.)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